

[主持人语]在一个所谓无主潮的新世纪文学格局中,“底层文学”以其主题整一性和创作盛大性成为一个显著的文学潮流,很多底层写作者在这个潮流中涌现出来成为著名作家,并因此改变命运。在这支引人注目的创作队伍中,湖南湘潭籍作家楚荷显然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作家。迄今为止,他已完成了3部关于底层的长篇小说和数目不少的中短篇小说,其中长篇小说《苦楝树》和《工厂工会》先后在权威文学期刊《当代》发表。在底层写作大面积的苦难倾诉中,楚荷不囿于自身的底层命运,站在广大底层人民的立场向社会表达基本权利的诉求,在时代转型期苦苦寻求工人阶级失落的主体性,代表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体表达底层的抗争与切肤之痛,其创作反映了转型期社会巨变给底层者造成的命运迁徙和精神震荡,具有难能可贵的纯正的底层性、敏锐的时代感和广阔的社会性。同时,他在艺术上坚守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作品具有鲜明的人民文学传统气质和人民美学精神。按创作业绩,楚荷早已进入底层写作的一线作家之列,但因为身处小地方和地位低微等不需明言的原因,他的创作还没引起国内文学界应有的重视。为了发掘楚荷创作中纯正的底层文学品质和丰富的社会学内涵,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推出楚荷专辑,特邀楚荷先生本人和4位学者撰文,从不同角度对其底层写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释;同时,这也是国内对楚荷创作的首次专题研究,希望藉此唤起学界对这位不应该被忽视的优秀底层写作者以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 我的纠结 我的小说

楚 荷

(湘潭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湖南 湘潭 411104)

[摘 要]我的小说与我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我所在城市国有企业普通工人的命运际遇息息相关,长篇小说《苦楝树》的主人公吴满的原型,就出自我所在的湘潭中环水务三水厂;长篇小说《工厂工会》的主线,则是我所在城市湘潭湘钢梅塞尔公司一位工会主席的真实故事。我的创作聚焦于底层生活,表现的是普通工人在当代社会变革中承受的苦难和失落,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人情的善良和人性的复杂。

[关键词]《苦楝树》;《工厂工会》;底层生活;痛苦命运;复杂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3)01-0018-05

## On My Tangle and My Novel

CHU He

(Xiangtan Central Water Limited Company, Xiangtan, Hunan 411104, China)

**Abstract:** My novel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my own life experiences as well as ordinary workers' destin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my city. The novel of Melia Azedarach, whose main character is the prototype of Wu Man, is from Xiangtan central water Sanshui factory where I located in. The novel of Union and Factory, whose main plot is one union chairman's true story in Xiangtan Iron and Steel Meisel Company in my city. My works, which focus on the bottom life, shows ordinary workers' suffering and loss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kindness and complicated humanity in society transition period.

**Key words:** Melia Azedarach; Union and Factory; bottom life; pain destiny; complicated humanity

收稿日期: 2012-12-08

作者简介: 楚 荷(1962-),原名谭进军,男,湖南湘潭人,湘潭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职员,国家二级作家。

我讨生活的地方,叫湘潭中环水务三水厂。老早前,叫湘潭市自来水公司三水厂。我之所以说“老早”,是这词儿满是沧桑,又因那岁月离我已愈来愈远,感怀逝者如斯。那年,自来水公司卖给了中环水务,换成了现在的名儿。

三水厂地处湘潭板塘。

如今的板塘,高楼林立,茶楼、酒馆、KTV、洗脚楼,鳞次栉比,端的是歌舞升平,好一派繁荣景象。老早前的板塘,远没有这么多商家,也远没这么多光鲜的高楼。但,也的确曾经繁荣过。只是那时的繁荣,是另一种繁荣。

那时,板塘是湘潭重要的工业区,有许多国营企业。每家国营企业,都红红火火。其中,湘潭纺织印染厂,湘潭玻璃厂,湖南轻工机械厂,是大型企业,更是牛气得叫湘潭人啧啧称羡。在这几家企业工作的员工,一个个也很是牛逼,走路也较在别的企业工作的人们,有更多的精气神。三家中,又数湘潭纺织印染厂规模最大,有万多员工,厂区和家属区连成很大一片。片内,道路纵横,楼舍林立,俨然一座小城。

妻在湘潭纺织印染厂工作。

妻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她们四姐妹以及她们的母亲,都和她一样,在湘潭纺织印染厂工作。我没见过岳父,他在我和我妻子恋爱前就死了。妻的娘家在纺织厂的宿舍内,房子用现在的目光看,有些逼仄,也很不规范,三间房一厨一卫,其中一间房兼做了客厅。左右邻居,居住条件都差不多。这种居住条件,在当时,已是算不错的了。

邻居全是纺织厂同事,或者家属。有纺织厂的中层干部,有普通工人,有技术人员。他们之间,因为“大锅饭”的原故,收入都差不多。抑或正因为都差不多,便无论什么身份,均没有比上不足的遗憾,也没有比下有余的骄傲。也就远没有阶级、甚至阶层的差异。彼此之间,在既无俯视,也无仰视中,坦诚地交往。于是,彼此间再熟悉不过。谁是什么脾气,谁家乡下亲戚多,谁患有什么病,大家都能说出个一二三。谁家吃好菜,大家都可以去夹一筷子;谁家有瓜子、花生、水果之类,大都会拿出来,供大

家共享。没事时,邻居们坐在一起,东南西北瞎扯,或者,在一起打意思不大的麻将。

我回忆着,与现在的邻里关系相比,那时候的邻里,在几乎没有的竞争中,在微乎其微的差异中,形同兄弟姐妹。彼此间不用设防,每个人都能将真诚的一面展示出来。于是,在无所求的真诚和友善中,大家都觉得满是温馨。我现在居住的小区,也算现代了,但邻里之间,颇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意味,便是相逢一笑,也笑得苍白和勉强,其原因,是我们彼此缺乏信用的基础。

不用说,邻里间真诚和友善的前提,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企业,并且企业欣欣向荣,员工与员工的收入差异,相差无几。更重要的是,这个企业给了员工们归属感:生老病死,企业全包,什么都不用忧虑了,极自然,人的进一步需求,就是人际关系的和谐。

后来,妻当然嫁给我了。水厂的居住条件,远比湘潭纺织印染厂强。结婚证一办,就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那种房子,虽然只有60平米,在当时,足以叫其他单位羡慕了。

我们住在了三水厂。

我们三水厂,凭着一个“水”字,比湘潭纺织印染厂,比湘潭玻璃厂,比轻工机械厂,更要牛逼。所谓“水衙门”“水老虎”,市民发明这两个词儿,在反感特权中,有恨得牙痒痒的意思,却也在无奈中,包含了许多仰慕。因此,老早前的那时候,我们水厂的员工,从灵魂深处溢出的那种骄傲,还真能叫人羡慕八辈子。

那时,我们厂只有七八十个人,却有自己的篮球队、相球队,有我们自己的图书室、澡堂、食堂、幼儿园、桔园。院子里,绿树成荫,绿篱修剪得中规中矩;数不清的鸟儿,在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角落,你唱我和;各色花儿,你尚未谢我待放,四季都可以闻到醉人花香。

我们的篮球队,在大小企业林立的板塘,居然能达到中等偏上水平;我们的相球队,与当时最厉害的湘潭玻璃厂搞过一次对抗赛,一次擂台赛,对抗赛打成了平手,擂台赛也打得他们只剩下了擂主。而每年的春节晚会,自娱自乐中,像模像样。至今,那些晚会的袅袅余音,还时不时在我脑子里

响起,叫我生出许多留连和怅惘。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福利和收入,能让人垂涎三尺。逢年过节,肉、鱼、鸡、米、油、水果、腊货,全有发。我常和同事开玩笑,说:“公司考虑不周。考虑得周到,也该发葱,发蒜,发盐,发味精。我们就不用出门再去采买了。”那时候,我们年年涨工资。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一个普通员工的工资,绝不会比一个科级公务员的工资低,于是,我们的骄傲,也就不会比一个科级公务员少。

## 二

那时候,我们这些国企员工,备感温馨,还真如桃花源的居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于彼时,国际大势,已使我们的国家,远远地落后于先进国家。再不改革,计划经济的弊端,将使我们的人民,在低水平的温饱线上徘徊,在人与人收入的确差距不大的自得其乐中,更加麻痹,更加缺乏奋斗的精神。我们的国家和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国家和民族很可能将在冷水煮青蛙中万劫不复。

许许多多愿意思考的人,都看到了国家前程的堪忧,都在心底呼唤着改革。这些愿意思考的人中,就有一个我。因为中国除了改革,已无路可走。

高层顺应着时势,国家真的开始改革了。首先只是喊喊,渐渐地,动了真格。动了真格的改革,一方面,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企业,如雨后春笋,成批成批冒出来,并且,迅速地发展壮大,很快地成燎原之势。另一方面,国营企业则一批批地倒下去。板塘那些曾经牛气了几十年的国营企业,或倒闭,或卖给了私营业主,或如我们自来水公司,被投资公司鲸吞了,变成了湘潭中环水务。真所谓“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茫茫大地真干净”,我甚至无法在板塘再找到国营企业的影子了。

我丝毫不关心企业是国营还是私营,是合资,还是独资,因为只要他们在这块国土上,就是中国的企业。我也不太关心企业的生生死死。企业的生生死死,就如所有生命的生生死死,再平常不过。但是,我的确或目睹或耳闻了许多国营企业在转制,在破产过程中,员工太多的失落和苦难;也的确目睹或耳闻了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原来企业的负

责人或者相关人员,太多的卑鄙无耻,他们或明或暗或蚕食或鲸吞着国有资产。而这一切,竟然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下进行,好似他们的行为,都是如此地正当,因此,他们也就如此自然、轻松,甚至在这自然和轻松中,做了时代的先锋。

我无意去探测在改革进程中,某些方式方法是否合理,甚至是否合法,因为那不是我的地位需要探测的,也不是我的智慧所能探测的。但是,那些国企员工的失落和苦难却揪着我的心,那些硕鼠的行为,时不时叫我咬牙切齿。

而企业一经改革,虽然厂房还是那些厂房,设备还是那些设备,企业的精神却几近彻底地改变了。譬如说曾经牛气冲天的我们自来水公司,企业改换旗号后,我们水厂曾经的图书室、澡堂、幼儿园已没了影子,桔园已野草丛生,桔树大都死去,篮球队、相棋队、过年过节的那些福利、每逢春节必有的晚会,早已成了遥远的记忆。毫不夸张地说,曾经有过的以水厂为家的精神,荡然无存了。我们的经理,更是在转制后的一次大会上公然说:“谁说国营企业是家?你家里的东西,你想拿就拿,国营企业的东西,你拿拿试试。”而这个经理,转制前已经是经理了。刚转制,便忘记了他也曾经是国企的员工。忘记了他之所以成为经理,是国营企业的机制,造就的他。他已在号召着员工,摒弃将企业当作家的精神了。

我知道,那些东西是国营企业的文化,既然不是国营企业了,那个文化也当然得弃之如敝履。

的确,国家非改革不可。可是,当那些文化就这样无踪无影;当那种可谓桃花源才有的人与人的和睦,不再呈现;当改革中,某些胆大妄为的人,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我的心有着不可明状的悲哀,时不时,还会喷发出难以抑制的愤怒。我当然得写一部小说,纪念曾经的美好,当然得写出普通工人在这场改革中的失落,为他们而呐喊,于是,我写了长篇小说《苦楝树》。

《苦楝树》的主人公吴满的原型,就在我们水厂。只是这个原型的脸上没有麻子,甚至长得有几分俊气。他像吴满一样,兢兢业业地工作,他的电工水平,在我们自来水公司首屈一指。他和吴满一样,无论是谁,只要向他请教,都会毫无保留地海人

不倦。可以说,我们水厂的设备,只要是电器方面的问题,没有他解决不了的。因此,他也像吴满一样,得到了无论领导、还是同事发自内心的尊重。因为,任何领导都知道,要提拔一个中层干部,随手一抓,可以一大把,但要再找一个像他一样的技术尖子,在我们自来水公司,却没有办法找到了。也像吴满一样,在第一波改革来临时,当经理加4级工资,中层干部加3级工资,他和许许多多技术好与不好的员工一道,加2级工资。这波改革,带给我的信号,是权越大,工资越高,技术不技术,狗屁不值了。这种唯权、唯上的改革,造成了人人都想当官的局面,造成了无人有心学技术的后果。我当时觉得,这种改革,变味了,走样了。改革的第二波,即我们公司卖给中环水务那年,这个原型恰恰50岁,于是,在40、50的政策下,他内退了。极自然,他也和吴满一样,凭着他的技术,很快地在一家私企找到了工作,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那家私企的宝贝。因此,他在那家私企的工资,甚至是在我们水厂时的3倍。

小说中说,因为自然而然的原因,那家国企里,技术最好的,被人称为“哥”,如吴满,被人称为“满哥”;次一等的,在姓氏前加一个“老”字;再次一等,则把他的姓氏和他的工种,连在一起称呼;再次一等,则被人在姓氏前加个“小”字;最末等,则叫他的浑名。我们水厂还是国企时,并没有小说中的“哥”“老”“工”“小”。但是,我感觉到了这种氛围的无处不在。技术工人中,谁的技术好,无论领导,无论员工,都将给他更多的尊重。技术末流的,没人能看得起他。为了写出这种氛围,我设计了这种“哥”“老”“工”“小”,将那个氛围抽象了出来。

在我们厂围墙外,有一棵苦楝树。那天,那棵苦楝树死了。我问我厂一个绿化工,前段时间,这棵树还好好好的,为什么就死了。他告诉我,苦楝树是一种速生乔木,寿命只有40年左右。我算着许多国企寿命,居然和苦楝树如此巧合。因此,我将小说取名《苦楝树》。我赋予小说中苦楝树与这家国企、与这家国企中员工几近相同的命运——他们都有一个“苦”字。

《苦楝树》在《当代》2005年2期头条发表后,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好评,北京大学甚至将这部作

品,列为向全国读者推荐的七大长篇小说之一。

### 三

改革后,我妻子和她的三个姐妹,无一例外地失业了。我的小妹妹,由于失业,染上了毒瘾,最后,死在了毒品上。我的大妹妹,失业后,在一家茶楼,找到了筛茶倒水的职业。这职业,使她每个月有800块收入,同时,政府仁德,给了她每月280元的低保金。只是她不到13000元的年收入中,每年必须向国家缴纳7000余块养老金保险。大约最幸福的当数姨姐,千难万难缴了几年养老保险金后,于两年前,光荣退休,有了生活保障。我妻子则比不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家做着全职老婆,在我每年替她缴足养老金中,等待着幸福的退休年龄——50岁。她们的母亲,抑或是不愿意看到企业被卖,在纺织厂被卖前,患病死了。

我认识的许多曾经是湘潭纺织印染厂、湘潭玻璃厂、湖南轻工机械厂,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曾经的国企的员工,失业了后,或者开摩的送客,或者离乡别祖,去他乡打工,或者摆夜宵,或者凭着色相,做人家情人,或者索性卖淫,还有许许多多或者的或者。当然,他们中也有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人脉,混出了人模人样,做了时代的新贵。

而我们湘潭市自来水公司三水厂,成了湘潭中环水务三水厂后,员工工资上涨的速度,不但低于国家平均工资增长的速度,甚至低于物价增长的速度,十来年过去,我们已经不及湘潭市的平均工资了。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些国企余孽,曾经有过的那份骄傲,已荡然无存。值得欣慰的是,据道听途说,新任经理表态,在他的任内,让大家的工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我的心底,希望着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都活得有尊严,都活得幸福,至少得活在希望之中;我希望着这场改革,在带来国家和民族的辉煌前途的同时,也让每一个生命的个体,享受着改革的成果,得到国家的安慰。但,我又知道,任何改革,都势必会对利益分配进行调整,也就势必有利得者和失利者。于是,我在纠结中,思考着,如我,如我妻子和她的姐妹,如我周围许许多多的工人,组成的失利

大军,怎样才能维护上天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至于真像牛马,任人驱使和宰割。

恰恰这时,我听到了一则故事,在我们湘潭,有一家叫湘钢梅塞尔的公司,先是国营的,后来和德国人合资了。合资后,资方的的确确有些乱来。那些工人了不得,没去找上面吵和闹,而是在市总工会和湘钢工会支持下,成立了自己的工会。那工会,还真像回事儿,还真切切实实地为工人的利益和资方进行着斗争。他们成功了。因此,他们的工资不低,他们的福利不坏。

我眼前一亮,确信只有成立属于工人们自己的工会,才能维护工人权益。于是,我采访了湘钢梅塞尔的工会主席,听他讲了大量的成立工会时的故事。那些故事,告诉我,要成立一个这样的工会,几乎是一步一个难。而更艰难的,则是以后的维权。这位工会主席的故事,成为了《工厂工会》的主线。

为了使小说写得更像个样子,我采访了几家原是国企,后来卖给了私人老板的企业的一些员工。他们告诉我,企业改制后,资方将原来的四班三运转,改为了三班两运转。我采访的人中,没几个人不是满肚子苦水,没几个人不忆甜思苦。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状?他们说,告了,没用。这使我更觉得于非国有企业的工人们,只有成立工会的路,才是他们应走的路。

小说原名《太阳河上太阳桥》。那座桥,是我去湘潭县花石镇,看到了一座破败的汉时桥。那桥,已是野草萋萋。我望着那桥,忽然觉得,我的小说中,也该有一座桥。我给小说中的这座桥取名为太阳桥,将桥下的小河取名太阳河。小说中的太阳桥,也是汉时所建。

我希望工会像一座桥,这头是工人,那头是资方。希望这座桥化解着工人和资方的矛盾:不但维护着工人的权益,也做着友谊的使者。我相信,工会是工厂和谐的前提。而和谐,是工厂能发展壮大的必要基础。如能这样,工会这座桥,就将成为一道美丽的彩虹。

后来,这部长篇小说,被《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头条发表在2009年5期上。发表之前,编辑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不如改名叫《工厂工会》。”我觉得有理,就改了名儿。

#### 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曾经国企的辉煌,以及那些国企破产改制后,国企员工们的失落和苦难,都渐渐地离这些注定的失利者中的大多数远去。这几年,我也的确看到了,我那些曾经失落的朋友中的大多数,如今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他们在政府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已经走过了人生的低谷,已经将曾经在国企中的主人地位,以及失落时的苦难,都当作包袱放下了,他们看到了曙光,他们又重新挺直了腰板,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明天,将和我们的共和国一样,比今天更好。

他们走出来了,我的创作也得从中走出来。我想,我将来的创作,该将目光投向更大的底层,因为在更大的底层中,有着这种或者那种苦难和失落,因为底层,需要国家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我的能力和智慧,除了让自己的心和底层大众的心一起跳动,再也做不到什么了。那么,我就做我能做到的,让我的心和他们的心永远一起跳动。

责任编辑:黄声波